

董丛林
著

晚清教案危机 与政府应对



中华书局

董从林
著

晚清教案危机 与政府应对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教案危机与政府应对/董丛林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8.3

ISBN 978-7-101-12897-0

I.晚… II.董… III.教案(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K249.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7068号

书 名 晚清教案危机与政府应对

著 者 董丛林

责任编辑 吴冰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

201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7½ 插页2 字数454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897-0

定 价 68.00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级结项成果

(证书号：20130841)；

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1707060201）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晚清教案的基础性背景与宏观态势 / 28

第一节 基础性背景情势撮要 / 29

第二节 晚清教案的阶段性特征 / 54

第二章 教案危机的生发及主体反应情状 / 72

第一节 加深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 / 72

第二节 “发酵”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 / 93

第三节 生存危机凸显与危机反应机括 / 110

第三章 力求化解教案危机的基本方针和思想 / 122

第一节 “持平办理”教案,力求“民教相安”的方针 / 122

第二节 “非攻教”思想的微妙意蕴 / 150

第四章 涉教专章的拟议事局 / 164

第一节 庚子前全国性教章的拟议或订立 / 165

第二节 庚子前地方性教章示例 / 205

第三节 庚子后的教事约章问题 / 214

第四节 涉教专章综合评析 / 237

第五章 其他外交要项的尝试和“反制”运筹 / 244

第一节 见诸尝试的外交要项 / 244

第二节 旨在反制对方的“内部”筹策 / 285

第六章 对反洋教阵线中不同群体的态度与处置手段 / 304

第一节 反洋教阵线的构成及演变概况 / 305

第二节 对涉案官员：无奈中的追究与庇护 / 312

第三节 对反教士绅：处置中的两难情状 / 361

第四节 对打教民众：“惩凶为第一要义”下的酷虐与枉屈 / 385

第七章 教案处置中清廷与地方政府的分合异同 / 409

第一节 教案处置的相关机构与决策机制 / 410

第二节 “持异派”督抚的教案处置态度示例 / 427

第三节 基层官员在教案事局中愈趋窘迫的境况 / 440

第八章 庚子教案及“善后”处置问题 / 468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极盛”前夕的过渡和铺垫 / 469

第二节 教案积留与“善后”处置 / 482

第三节 廷雍、毓贤在庚子事局中的类别标本 / 500

第四节 与神秘文化情境的密切关联 / 519

结 语 / 530

征引书(文)目 / 535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与学术“我史”

遥忆 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学界“文化热”方兴未艾的时日,自己正值本科和研究生相继毕业,也为该“热”所吸引。因所学为历史专业,遂对“历史文化”发生浓厚兴趣,庞杂地涉猎了相关方面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但掩卷思来,又陷入问题的复杂性里颇感困惑。仔细思忖,觉得自己初入学术之门,要想悟出一点道理,获得一点切实心得,与其在大面上浮光掠影,不如择点定向掘进。当时关于中国近代教案的研究兴起,自己参加过相关学术会议,受到启发,对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产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而又有着广阔学术空间的领域。这当然不仅仅是“文化”问题,同时也紧密牵系“政治”,及至中国近代尤其如此。但无论如何,“文化”因素居于更为隐深的层面,在任何时期都发挥着不可轻忽的作用。若从“大文化”的界面看,其涵盖和包容性自可更为宽泛,对于基督教与中国关系问题来说也更显切要。基此认识,遂产生从“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融通上尝试探研该问题的朦胧念头。

正是在这种情境中,适逢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下简称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策划“中华文库”

丛书,广泛征集选题,从中推敲遴选。在师友们的厚爱之下,所报选题有幸获中,得以操作,遂有自己最早的著作《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于1992年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分别出版繁体竖排本和简体横排本(后有1996年重印本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新版本)。现在回头检视该书虽不免自惭粗浅,但更觉有值得自珍之处:一则当时固然有初出茅庐不知深浅的懵懂,但对于生性怯弱、不善争竞的自己来说,此番能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可谓难能可贵,该书也得以操作成为自己学术生涯初始阶段中的一个尤值怀念的节点;二则觉得“中华文库”丛书文体上的特定要求,很适合自己的语言表述追求,写作该书对自己一种文字风格的培养具有奠基意义(当然,限于体裁这种文字风格并未在此次新著中典型体现);三则该书写作将自己引入了一个特定学术领域的门径之内,这与此次新著选题有着密切关联,若不是有前书之缘,自己也许就不会有在该学术领域的延续耕耘。现在回顾梳理起来,多年间自己主要从事的晚清史研究所涉内容领域,一是湘、淮派系,二是社会传闻,三是教案与社会。研究中这三者并非割裂孤立,而是尽量有机连通,但其毕竟又可显分界域。其中“教案与社会”,便是以《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为起点,由此衍生下来的。该书之后,在这一领域自己又陆续发表若干论文^①,算是研究上的时有接续,意味着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和致力没有终止。并且也逐渐有了选择一个合适题目作系

① 截止本书写作之前,相关论文如:《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存否之我见》,《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19世纪60年代直隶教案概观》,《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4期全文转载;《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1年第9期全文转载;《中国近代的“教案”“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反洋教”辨析》,载《历史与现实论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论李鸿章的“洋教”观》,《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寻根》1994年第2期;《孙中山宗教观的近代政治文化蕴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8年第1期全文转载;《张之洞的“非攻教”思想简论》,载苑书义、秦进才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转下页注)

统研究,再次以著作形式呈现较大体量成果的愿望。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2008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见《课题指南》中的“中国历史”类里,有“近代社会危机与政府对策”的分项专题,觉得可由此斟酌选题,想到:就近代社会危机的具体激发因素而言,自是多方面的,而“教案”则不失为重要因素之一;总体上的近代社会危机面相,也是由诸多方面整合表现出来,而教案危机就是其中一个醒目的方面。有关教案危机的情况,虽说学界在相关成果中也间或涉及,但做系统深入的专门性研究不够,进而将其与“政府应对”联系贯通起来,并特别侧重于后者,以清政府方面作为“主体”角色,从其施政和社会管理的角度予以考察,由相关特定内容进行专题研究者更为鲜见,遂有的放矢地就此选定题目^①,可以说此题有着较为充分的开拓空间和创新余地。选题除了基于对自己这方面学术史(可谓学术“我史”)的把握外,亦需对学界相关学术史(可谓学术“他史”)能有基本了解和分析。“我史”在本目中出于说明选题缘起所需业已兼作具体交代,下目中即专就“他史”再作概略陈述。

(接上页注)版;《庚子教案的积留和“善后”处置》,载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晚清官绅“容教”论中的文化因素解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关于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教权”规定问题》,《光明日报》2002年11月5日;《张之洞的“育婴”筹措述论》,载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现象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3期摘转;《“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9期全文转载。本注中所列篇目,除本书因具体征引内容随文注出者外,其余不再在《征引书(文)目》中一一开列。

① 获批项目原题为《晚清教案对社会危机的激发与政府对策》(批准号:08BZS027),为更简练和妥帖,成果结项时即改用了本书名称的题目,即《晚清教案危机与政府应对》。

二 学术“他史”撮要与简析

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情况来看,关涉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状况、其时教案及社会影响方面的成果颇多。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①,内容上有的即主要限定在或侧重于晚清时段,有的虽兼涉甚至主要是限于其前或其后,但对于从更长时段的整体联系上审视晚清之时的情形,也提供了必要的参照。以晚清政府为主体来考察其对基督教应对情形的虽然也有但是稀见,譬如见有专题探讨晚清政府关于基督教政策者^②,其内容涉及的主要即相关政策,特别是相对具体的某些政策,与原则性方针的结合观照不够,关于政府的应对

① 如萧静山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省献县天主堂 1931 年印,后有上海书店“民国丛书”1989 年影印本、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3 年“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系列本等);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史概论》(土山湾印书馆 1938 年版,后有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年新排本等);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 1940 年版,后有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的多种印本);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 1947 年版);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湾光启出版社 1967 年—1973 年陆续出版,后有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新排本等);李时岳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1985 年新版);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6 年版,1973 年第 2 版);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 年初版,至 1978 年第 3 版);魏外扬的《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1978 年版);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1991 年第 2 版)、《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张力、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孙江的《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陈银昆的《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赵树好的《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等。各书列举顺序系按所知最早出版年份排列。以下行文中具体引用或参照之书涉及上列者,有多种版本的再行出注时一般只注所据之本,与这里括注版本相同者则版本项不再重注。《征引书(文)目》中将此注所涉各书依次一并列出,非独一版本者择注所阅及的一种版本。

② 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 2004 年版。

“实践”自也非其侧重,于此的涉及面相对狭窄,这当然是由该书的内容设计决定,而不是说属其本身缺陷。有外国学者也有若干可资参考的相关著述,其原著在笔者阅及的有限范围内,于此注及数种为例^①,中译文本和英文报刊则随具体引用出注。有关论文,除散发于报刊者外,较为集中地见于数种专题性文集和关于教案史、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学术会议论文集^②。另外,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会议论文集中也辑有部分有关传教和教案的文章。鉴于论文篇目多多,于此不再繁琐开列,凡本书中具体征引或述及者,随文出注。

既有相关研究成果,都凝聚着作者的智慧和心力,有着各自的创获,对于本书来说,既能在特定方面提供参考和助益,其总体上又奠定

①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这是美国学者赖德烈(1884—1968)的篇幅达九百余页的著述,“在西方学术界中至今仍然堪称一份非常具权威性的著作”,也是笔者特别注意的英文原著。在本书稿完成大半的时候,有幸得见雷立柏等人的中译本问世,遂将原自译引文予以比对改换,统以该中译本出注(原著仍在《征引书(文)目》中单独列出)。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该书作者[美]保罗·科恩,也是[美]费正清、刘广京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的作者。Jessie G. Lutz (ed.),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Evangelists of What?* Bos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65. 这是美国学者杰西·G. 卢茨所编文集,保罗·科恩的 *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 (《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收录其中。

② 专题文集,如罗光主编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湾光启出版社等1967年版);林治平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邵玉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版);林治平主编的《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朱维铮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陶飞亚的《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吕实强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选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版);邢福增的《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版)等。相关会议论文集,如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冯祖貽等主编的《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吴金钟等主编的《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陈建明、刘家峰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等。

了可资凭借的知识基础和背景轮廓。当然,具体到本书中的特定方面内容,集中、系统而深入的专题考察似不充分,多属连带性地普泛论及。在观点到话语系统的呈现上,则尤需注意前后变化。譬如对晚清教案激发和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问题,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往往不能正视,言说片面、失实甚至曲解的情况并不鲜有;而国内学者从总体上看,在立场、观点上能够相对持正(教内学者或有“护教”倾向)。当然,大陆学者在不同时期,其言说上的差异性也颇为明显。一般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于革命史观而感情色彩强烈的表述典型、多见,而新时期以来则愈发趋于平和理性的学术化语境。

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李时岳先生所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同是在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和1985年出过两个不同版本。前者第一章的标题是“洋教士的侵华罪行”,下属五个目次的标题分别为“殖民主义的先锋”“侵华的谋士和间谍”“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贪得无厌的豺狼”“无恶不作的流氓恶霸”,感情色彩是何等强烈!而后者(1985年版)则面貌明显改变,目次(未再分章,列为十七篇目)中再没有像上列那样的标题,用的是“基督教势力的东来”之类,相对“中性”些了。当然,并非到这时才有此突变,早在1962年,他就在北京三联书店出有《反洋教运动》(该书附录之外共列十四篇目),是据《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改写而来,而1985年之书,又是依傍《反洋教运动》修改而成。其有交代:“二十多年来,关于反洋教的研究颇有进展,发现了不少新资料,新成果,本应全面增订,写得更好一些,我也有这个愿望,但时间不足,只作了局部的修订和补充。”^①由这“局部的修订和补充”,亦可见知其观点和表述上不少新的变化。可以说,以作者当时已有的视野和史观,若时间允许作“全面增订”,当会以更为新颖和丰赡的面貌问世。由同一作者所作中认识和表述上的不断趋新,见知其前

^①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点说明”,第1—2页。

后反差,这个例子应该说是典型的,尽管其“同时期”里1958年和1962年两书已经有所不同。若从学界的总体情况来看,这方面“时期性”的前后反差自彰明较著。于今,像当年那种感情色彩强烈而学术理性欠缺的话语已属鲜见。

除研究性成果之外,相关资料当然也需述及。这类文献可谓“原料”,乃成炊之米,其丰薄优劣于研究关系甚大。当今,就资料条件而言当然是很好的,文献本身之外,检索获取的途径和技术手段方面也空前优越。而无论如何,对一项研究来说,核心性、系统性资料的状况如何,无疑非常关键。就资料利用方法而言,尽量广泛搜取而力求其“博”当然是应该的,但一味靠挖偏角来求“新异”则未必可取,那样当属剑走偏锋,还是需要重心,求可靠。就本书来说,特别系统而重要的资料源,一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教务教案档》,凡七辑二十一大册,1974年—1981年陆续出齐;二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共六册,1996年—2006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齐。《教务教案档》系据晚清总理衙门(后改外务部)档案中的教务教案部分整理影印,各辑按“通行教务”及京师、直隶和其他各省区(均单列)教务分类,各类中按时序排列所辑文件,文件类别为诏谕、奏疏、函札、照会、咨文、条规、告示等。总之,是清廷和总理衙门等机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外国机构和相关人员的文牒,而又以清方者为绝对主体,故与拙著的资料需要特别切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选编排印的是有关教案问题的中外档案资料。其中占其总体量近三分之二的三册为“清政府档案”,文件类别上与《教务教案档》类似,两者可互为参照和补充利用,也是与拙著的资料需要特别切合者;占其总体量三分之一略多的后三册分别为中译的法、美、英的相关档案,多为其政府的外交文件,也有教会人员的通信等。这样,该套书中的中外资料自有互为补充和参酌审鉴的使用价值。之所以将上述两套资料书籍

特别述出,就是因其体量博大,内容宏富,而又特别切合拙著的资料需要,在这方面给予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深受其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大型资料汇编,以及若干虽说体量较小但也不乏撷珍辑萃的资料书籍,拙著中也有较多利用,不能一一列述。总体算来,拙著征引涉及的资料书刊(著作、论文除外)计有百数十种,并且在抓取重点、主辅结合、认真酌量、追求可靠方面也确实用心用力了,可以说做得比较实在而少虚饰。

三 架构设计与学术检视

基于对相关学术史的参照分析而选定题目之后,接下来的学术运思,自是在总体立意提挈下的架构设计。当然这首先要“草图”,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不断予以调整完善。就本书定型者而言,除就相关必要事项作概要交代的“绪论”,以及最后做若干要则提示(包括带有引申性者)的“结语”之外,共分八章,这八章又可归纳为六个“单元”,将各自要旨和其间逻辑关系简要交代如下:

第一、二、三章皆可独作一个单元。

第一单元(第一章),观照晚清教案的基础性背景与宏观态势。其基础性背景,一方面涉及鸦片战争前夕和其间基督教在华的“历史活动”基础,另一方面更包括战后中外条约及相关上谕中纳入教权内容的“现实政治”基础,特别是这后者,既是教方势力非常态发展而致教案加剧的基本根源,又是限定教案处置的根本前提。至于晚清教案的宏观态势,主要是予以阶段性的概观和分析,既勾画出时段上的脉络、轮廓,又揭明各阶段教案的基本状貌和特征。这样,本单元内容便为后面的考察提供了综合性铺垫。

第二单元(第二章),考察教案危机的生发及主体反应情状。主要是从教案加深中国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发酵”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同时使得特定群体生存危机凸显,来审视危机情状。并进而探析

不同群体基于对危机的特定感受所作出的相应反应,以见其机括的微妙、复杂。并可从中体察,主体于危机的反应对于教案来说不仅仅是“结果”性的,更是“过程”性的,也就是说,它贯穿于教案生发的全局之中,既是显性事象,也是反洋教的一种心理基因。总体而言,教案危机当然是晚清政府应对并试图化解的对象,但后边对晚清政府相关筹思和运作的考察上,并不能拘泥于同危机表现的具体对应(若那样会是机械的,妨碍可操作性)。本单元内容为总题所包括的两个并列部分之一,既有着相对独立性,也为晚清政府之于教案危机的应对提供总体的“标靶”。

第三单元(第三章),解析清政府力求化解教案危机的基本方针和思想。对其“持平办理”教案,力求“民教相安”的方针,既予以结构和内涵上的揭示,也显现其较大的弹性幅度(亦可谓张力空间)。而依凭它来制定相关具体政策,自然也就有着相应的机动余地。对这一方针,清政府当然着力晓谕,而民间“新派”人物也在舆论上积极配合,甚至有的新教教士也有“合拍”言说。与此方针密切关联的,是意蕴微妙的“非攻教”思想,它在包含一定策略性的同时,又带着沉重的政治无奈,特别强调与教方“相安”之下暗自“修政”和强化中土“圣道”,便是包含策略与无奈双重性的纽结。这一思想在洋务派大员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成为其涉教筹策乃至前述“方针”的重要思想基础。较比此后相关具体筹措层面的内容,本单元主要是从“纲领”高度提挈,旨在以“纲”引“目”,而相对“务虚”(即“理念”性突出)也可谓其特色。

第四单元包括第四、五两章,主要涉及晚清政府应对教案危机具体筹措层面外交向度的内容。其中第四章,审视涉教专章的拟议事局,主要分庚子前、后(含庚子)两大阶段,对相关主要教章的筹议及结果予以梳理和察览。总体上看,清方议订教章,旨在将条约中的教事内容细化并加以必要补充,特别是将对教方的暗含性限制之项明示出来,以布设扼制教方和外国逾约、逾章的醒目防线。而对方则必权衡

利害以定取舍,故较少有使清方能够如愿之例。在经庚子事变的特定形势条件下,在教章续有筹议的同时,又有乘中外重议“商约”之机,在成约中驽入新订教款之事,这既可从事类上与前订涉教条约衔接,也可视为清方在特定条件下外交努力的“新果”。第五章,展陈清政府其他相关外交要项尝试和“反制”性举措的运筹。这是条约、教章之外关涉外交的另一大方面的内容。对其所注意的,不仅是通常并无佳效的结果,而更在于其筹度过程,因为由此中间显露出的相关细节,也颇有体察价值。其暗中反制之策虽说不属典型的明面、正面外交,但也能体现一种隐性抗衡的筹度,与明面、正面的外交尝试事项联系起来,有暗有明,两相结合,相辅相成,自能更全面地反映整体。

第五单元包括第六、七两章,内容相对侧重在晚清政府应对教案危机的内政向度。其中第六章,审视清政府对反洋教阵线中不同群体的态度及处置状况。该阵线中包括官、绅、民三者,在有一定共同立基点的同时,其社会地位、角色特点及反教态度、表现也呈明显差异。一般来说,清政府对涉案官员追究与庇护兼施,而更重在平时加强有效限制;对反教士绅的卫道情结抱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不得已之下自然也要对其追究甚至是严厉惩治,而通常陷入两难的尴尬情状;对打教民众则惯持以“惩凶为第一要义”的严令,不惜酷虐与枉屈,其政治卑劣性于此毕露无隐。第七章,探察清廷与地方政府在教案处置上的分合异同。这是从清朝政权主体的“层级性”着眼,观照其上下关系及各自地位情状。在揭示出清朝教案处置的相关机构、决策机制、施政运作程序等概况的基础上,中央机构总理衙门和省区实力派大员的重要角色与作用便显而易见。当然,地方大员中有的在教案处置态度上与中央不无抵牾,颇有自作主张、我行我素的表现,可以“持异派”称之。这等人物或被迁就,或则付出了政治代价。至于最为基层的县级官员,在教案事局中的境况往往最为窘迫,甚至为之丢弃性命者。这一单元与上一单元内容结合起来,便可从内政、外交的不同向度,相

对全面地展现出晚清政府应对教案危机的具体筹度和实践状况。

第六单元即第八章,专论庚子教案及其“善后”处置问题。这是鉴于庚子教案与常时明显不同,一方面是反教风暴与更广内容的“灭洋”斗争牵缠一起,并且神秘性色彩特别浓重;另一方面是在列强借端发动的侵略战争之中清廷流亡,失却常规的社会掌控和施政条件,对教案不能及时处置而致成堆积留,及至议和之中附带一并处置,赔款、惩凶之烈空前绝后,并且事局异常复杂。也正因其特殊性,有的教案史著述中不予纳入,本书中则置为最后专章,特事特议,予以必要交代。而其后的相关史事,则已纳入“常时”范围在前边一并囊括。

这样,六个单元凡八章加前后的绪论及结语部分,内容上构成一个有着严密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所揭示的要旨在于:教案与反洋教紧相牵连但又不应混同(以往不乏混同论者),从根本上说是由教案引发或加剧社会危机。教案既体现着外国教会势力乃至所属国政府靠强权而获取的在案中的最终主动性,又直接黏结着反教一方,乃至牵缠清政府涉局处置,能全面反映角色格局。晚清教案情势极其复杂,也有着较为醒目的阶段性特点,而庚子教案尤显特异状貌。清政府对教案危机的感触,与民间社会有同有异,它当然是从自己的认知和立场出发运筹化解危机的对策,以“持平办理”教案、力求“民教相安”为基本方针,“非攻教”则可谓其典型思想基础。而其教案处置,乃外交和内政的密切结合体。外交方面,像筹订教章,进行其他要项的实际尝试和“反制”对方方策的运筹,都是清政府致力过的,但在国家半殖民地条件和“条约背景”的限定之下,其收效不可能显著。内政方面,则力求加强社会防范,在对反洋教阵线抑制乃至镇压当中,又对其中的不同群体态度有别。并且,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官员与官员之间也是呈异同分合兼具的复杂状况。从政府统治和社会生活秩序维系的角度看,清政府的教案处置不无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但误国害民的弊端亦颇明显。特别是在教案处置的涉外关系中,清方总体上不